

# 青未了

人文齐鲁

2015.2.12

齐鲁晚报

A22-A25

我们的节日什么时候形成的?几个大的节庆活动在西周时期就有了,但节期、节俗并不稳定,中华民族的节日体系到了唐代才真正定型。节日设置的真正意义,是以神圣的名义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,使社会关系凝聚、温馨、有秩序、有活力。冯骥才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好,“一年一度,一个人的特殊日子是生日,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日子是节日”。

## 节日承载着世世代代的“乡愁”

□张士闪



### 年画里教大家过年

在老百姓心目中,过年应该很热闹,很神圣肃穆,都希望营造一种红红火火的感觉。不仅过年时贴挂的剪纸、年画、对联是红的,昌邑市东永安村还会专门扎大牛、大马,在特定日期点一把火烧祭,火光冲天之中,红红火火的年味就有了。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火的意象?红火就是热闹、有活力,象征着过日子有奔头、人生有希望、生命不孤独。

贴门神曾经是全国各地很普遍的过年习俗,它昭示着家园的边界,寄托着一种“我爱我家”的家园意识。在家园边界里边,一家人关起门来礼神、敬佛、敬祖、团圆。除了在大门上贴门神,有些地方还在牲口棚贴上牛王、马王等,象征天地十方众多神灵对我家园的守护。

年画还是历史的象征。我们知道灶神像有双头灶、三头灶。双头灶是一夫一妻,显示着家庭的安详。三头灶的存在,记录着我们民族曾经有过一夫两妻、一夫多妻的历史时期,当然现在没有人在家里贴了,那是自寻烦恼。

潍坊杨家埠还有一种年画,画的是镇宅神鹰。画中神鹰英明神武,驱邪镇宅,还配有一首题画诗:“镇宅一神鹰,夜梦魂不警。单吃妖怪髓,专擒狐狸精。”在古代文学中,这个“狐狸精”可不是专指女性,也有男的。年画中的“狐狸精”也有男有女,男的长得跟奶油小生似的,女的年轻貌美、作风奔放。这类年画强调的是家庭的尊严,夫妻之间相互忠诚才是对家园的真正热爱。

有的年画是教大家怎样过年的,里面有情节,表现一个人如何长

大,从成年到结婚,逐渐撑起家庭的担子,年节期间如何筹备,包括对长辈如何孝敬、平辈之间如何走动以及对大自然风调雨顺的渴盼等等。这样的年画,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,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引导。

### 农村过年有神圣的参与

在笔者老家淄博洼子村,大年初一早上五点多有“敬天爷爷”的仪式。传统上,这个仪式是以“东南门,西南圈;进了门,就做饭”的标准,也就是在四合院的院内内操持的。在北屋东窗户外,设一个天地桌,由家中主事的人摆供点香祝祷。现在很多农村盖起了楼房,四合院没有了,但住进楼房的年轻人,三年前开始请教老年人怎么做这个仪式。于是就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,模拟着四合院的大致格局,一一如仪,越来越热闹红火。“敬天爷爷”仪式从“家自为祭”到“社区公祭”的转变,放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来看是耐人寻味的。这批上楼的年轻村民,以年节期间共同完成“敬天爷爷”的神圣仪式,标志着村落中一种新型的“社区归属感”的确立。

每年我都会去潍坊昌邑市考察小章竹马。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,每年正月初八这天,西小章村马家人是一定要竹马表演的,且大致遵循一定的巡演线路。小章竹马的表演离不开现场观众的参与,每一场演出往往是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,每人都有机会参与表演或随意观赏品评,每个人都能乐在其中。村民在村邻亲友的注视下,自扮角色登场,随整个马队做走马、圈马等动作,本身便有莫大的享受在内;

观众看着自己往日的熟人身着全套行头粉墨登场,甚至男扮女装,也觉得新鲜有趣。这个村尽管不算富裕,但是精神上是非常满足的。电视里的春晚毕竟是人家演的,虽然也很热闹,毕竟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世界。年味是我们自身的生活体验,只有实实在在的参与,才能体会到个人踏实的存在感和岁月轮转的特殊纪念意义。就此而言,我觉得今天的城市人要想过好年,就应该向农村学习怎样在节日之中安顿精神。

在西小章村的邻村,则保留着“烧大牛”、“烧大马”、“烧犴”一类传统,在正月间不同村落里次第举行,同时还有庙会和集市,共同营造着当地热热闹闹的年节生活。在当地村民的心目中,这些活动各自有着神圣的名义,比如独角大牛是孙膑的坐骑,大红马是关老爷的宝马良驹,犴是玉皇大帝出巡的行具,只有在火光冲天里“发”走,才能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,人们心里踏实。

中华民族是早慧的民族,其岁时节日体系极为合理,什么时候欣赏星空,什么时候野外踏青,什么时候阖家团圆,什么时候敬祖祭神,什么时候安顿孤魂野鬼,都是以一个家庭、村落为中心的层层关怀,有些合理的东西应该得以继承。当今小农经济渐行渐远,并不代表传统节日价值的必然凋谢,而应该在选择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中别开生面。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,毕竟承载了国民世世代代的“乡愁”,代表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温馨的部分,并将注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)

【口述城事】

### 想起当年春运“拉大队”

□韦钦国

马上就到羊年春节了,火车票早已成了“紧缺物资”,许多车次的车票一票难求。但“春运”出行难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,早在60年前(1954年),当时的铁路部门就提出过“春运”,恐怕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。

一百多年前济南就通了火车,因为运力实在有限,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坐火车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想买火车票尤其是热门车票得靠关系,如果有亲戚朋友在铁路部门或售票处工作,通过他们买票就相对容易。如果没有这层关系,就得拼体力去排队,有的需要提前两三天拿着干粮和被子“住”在售票室排队——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,郭冬临曾演过一个小品《有事您说话》,就与这事相关。

那时候,老济南站往一来开门,众多旅客就会如潮水般涌进来。为避免踩踏和方便旅客上车,车站工作人员就将旅客“编队”带着转圈,也就是让旅客前后相连接着天桥排队绕过来,借此疏导和引导旅客上车,当时大伙就把这种现象称为“拉大队”。这种现象好像很有喜感,适合拍电视剧,但事实上并不好玩,因为从候车的位置转到天桥再转回来上车,大约有两三千米,有的向北排到现在的长途汽车站附近。加之春运期间许多人肩扛手提,拖儿带女,且正值严冬,坐火车确实是很遭罪的事情。

买上票,排好队,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上车。春运期间车厢超员再正常不过,超过一倍也不稀罕,上车时前拥后挤甚至需要后面的人用力推一把才能挤上去,有些身强力壮的旅客就让车内的人掀起玻璃,直接从窗户爬进去。不瞒大家说,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寒假后开学去西安读大学时就干过这事:踩在同学的肩上从窗户爬进去,然后又把同学拉进车厢。

挤上车以后,许多人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但另一种折磨又开始了。当时的车基本都是绿皮车,有的油漆脱落,门窗开裂,设施陈旧,积满污垢,通风尤其不好,憋闷异常;人多得摩肩接踵,寸步难移。在这种情况下吃喝拉撒都很困难——有时卫生间里挤着两三个人,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。当时火车平均时速大约五六公里,路程远的要在火车上“晃荡”三四天,有些乘客累得出现浮肿甚至幻觉、跳窗等现象。

随着技术进步,特别是动车与高铁开通后,乘车环境、出行速度都得到了很大改善,“拉大队”的现象也就成为了历史。

□陈文兰

这张照片是45年前,6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过年穿着新衣服拍摄的。

1970年的春节快到了,6岁的女儿对我说:“妈妈,快过年了,小萍妈给她做了件花褂子,真好看啊!妈,你也给我做一件吧!”我立即答应:“明天妈妈给你做一件更好看的。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虽然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的口号喊得很响,但市场上的商品却匮乏得很。吃饭用粮票,穿衣要布票,吃肉用肉票。晚上,我拉开抽屉找布票。找来找去,只找到了8寸。8寸布票只能给儿子买一个兜兜啊!于是我去邻居家借布票,可谁家到了年底也没有剩余。

第二天,我拿着8寸布票来到了商店,想给儿子买个兜兜,却意外发现柜台里面摆着一些花布书包。我问售货员,要不要布票?“不要!”售货员回答。我想,买几个书包拆开,

不就布了嘛!“怎么卖啊?”“一个一块四”,售货员回答。啊?这么贵,一尺布才0.34元,一个书包最多也就二尺布。但是想到不用布票,为了女儿过年有新衣服穿,再贵也买。“请你给我拿三个。”我一面说一面掏钱。“一次只能买一个,”售货员说。第二天,我又去买回一个书包。第三天,我再去,售货员不卖给我了,说我有套购商品扰乱市场的嫌疑。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,我的家庭出身又不好,怕惹出麻烦,吓得我赶紧回来了。给女儿做罩衫两个书包不够啊,只好让爱人又去买回一个书包。

年三十晚上,我把买来的三个书包拆开,两个做罩衫的前后身,一个用来做袖子。一直忙到深夜2点才做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,女儿过年终于有新衣服啦!我把罩衫轻轻地放在女儿的枕头旁。

第二天早上,女儿醒来,看见了放在枕头旁的新花衣,从床上高兴地蹦了下来,拍着手



喊道:“噢!过年我有新衣服了!”望着女儿那高兴的样子,我眼里噙满了泪花。

为了“书包新衣”这个杰作,爱人提议让孩子们去照相馆照像留念。至今,我还保留着这张照片,因为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。

如今女儿开了一家服装店,想穿什么就穿什么,更不用为过年穿新衣犯难啦!

### 老照片女儿的「书包新衣」